

2022年4月1日（第257期）
仅供参考

美国印太战略 的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缺点在于，认为美国的政策偏好能在整个地区引起共鸣。拜登团队未来在执行和修改印太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印太区域的动态和复杂性，从现实出发，才能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和保障利益的能力。

中美关系

美专家称俄乌战争是美中两国缓和关系的契机

近日，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 网站登载了华盛顿特区非营利性组织 Search for Common Ground 的创始人兼前总裁约翰·马克斯(John Marks) 的文章称，乌克兰危机或许能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缓和的契机，文章摘要如下：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不久，中方明确表示愿意同美国就“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展开合作，也欢迎美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这两项举措都旨在加强世界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对冲战略。对于中国的提议，美国应该积极回应并就此展开谈判。共同努力改善全球基础设施是中美远离日益增长的敌对关系的关键举措，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当下，随着俄罗斯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国际敌人，美国采取相应行动缓和与中国的关系是明智的。因为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实践上，美国都很难同时对抗俄罗斯和中国。

当然，与中国的合作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敦促中国改善其国内人权问题的立场，但两国关系中的消极面不该成为定义双方关系的关键因素，也不应妨碍两国在共同利益领域的积极合作。

CSIS：制裁及出口管制或成中美新式“军备竞赛”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 3月25日登载了该中心高级顾问珍妮特·朱(Jeannette Chu) 的文章，分析了当前中美两国出口管制和制裁政策的现状与前景，文章摘要如下：

将出口管制和制裁作为国家单边或多边外交政策工具使用

的情况愈发频繁和复杂。但出口管制和制裁的“以牙还牙”属性会削弱出口管制的有效性，限制决策者的选择，也会加剧本就紧张的商业环境。

二级制裁是指禁止包括外国实体在内的第三方与受制裁实体开展业务。此类制裁愈发成为国家施加压力的重要手段。美国已将此类制裁的作用范围延伸到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如果中国违反管制条例与上述地区企业开展业务，相关中国企业将面临美国的二级制裁。

中国正在总结和吸纳美国的经验，凭借国家在企业事务中的巨大影响力，通过施加经济压力应对国际上的政治矛盾。2021年中国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这一法律机制适用于当外国公司和个人实施或遵守外国制裁，对中国公民造成不利影响或以其他方式干涉中国内政时，中国能对上述行为体进行谴责。中国采取的反措施类似于欧盟用于应对外国制裁和出口管制的“封锁”法规，且更具报复性。如果美国对央企施加二级制裁，中国势必会作出坚定反应。

随着美国不断扩充治外法权，围绕监管问题的“军备竞赛”风险日趋上升（尤其是中美之间），且前景难测，各类企业的违规风险大大增加，外企已经开始着手将中国业务独立出来，以便在响应国家政策时能及时隔离中国业务，减少损失。对政策制定者而言，要提前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除了要明确施与出口管制和制裁的时间点、着力点之外，还要研究撤销制裁的标准和规则。

美学者：美应建立遏华联盟维护秩序稳定

近日，《外交事务》网站登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迈克

尔·贝克利 (Michael Beckley) 的长篇文章称, 中国的崛起正在加速现有自由国际秩序的瓦解, 修复的方式是在共同的威胁认知基础上建立由美国主导的遏华联盟。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几十年来一直坚守着相同的战略目标: 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收复台湾、控制东海和南海、使中国重新成为亚洲地区的主导力量。因此, 近年来, 中国在多个领域采取积极的“扩张战略”。中国崛起的速度以及其愈发“强硬”的外交政策让地区乃至全球的国家感到紧张。这是自冷战以来, 第一次有如此多的国家面临所谓安全、福利和生活方式的“严重威胁”, 与中国的竞争正在形成新的国际秩序。

从现代历史来看, 国际上最强大的秩序——从 17 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到 20 世纪的自由国际秩序——并非是为了团结人类, 实现更大利益而建立。相反, 这些秩序是由大国建立的联盟, 旨在与主要对手开展安全竞争。简言之, 对敌人的恐惧, 而不是对朋友的信任, 才是每个时代秩序的基石。在政治学中, 类似的概念是消极的党派之争, 即选民倾向于对一个政党高度忠诚, 主要是因为他们鄙视其对手。

当今的自由秩序是美国冷战同盟的直系后裔。过去几十年里, 美国及其盟国了解自己代表什么以及敌人是谁, 冷战结束后, 单一的主要威胁逐渐让位给多元的次要威胁。在后冷战时期, 美国没有试图建立新的秩序, 而是继续维持自由秩序, 并且以扩大自由市场、民主共同体为其主要使命。

然而, 与所有国际秩序一样, 自由秩序也存在自取灭亡的可能性。事实上, 自由秩序并不自由, 反而是极度排外的。自由秩序强调自由市场、开放边界、民主、超国家机构, 而这些恰恰挑战了几个世纪以来团结群体的传统信仰, 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主权、种族和部落主义等。冷战期间, 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 这些

与血缘和土壤息息相关的因素不得被封存。苏联解体后，由于缺乏统一目标，自由秩序处于瓦解之中。

据皮尤研究中心 2021 年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欧洲和亚洲约有 75% 的民众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反华情绪开始凝结成具体的抵抗，但这些抵抗尚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只是零星存在，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国家仍然不能割舍对华贸易。但总体趋势是：在美国的带领下，不同行为体开始联手削弱中国的力量。

新兴的反华秩序从根本上背离了自由秩序，新秩序收回了对资本主义的相对重视。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体系”非但没有被全球化赶下台，反而几乎完美地被设计成了“榨取”自由市场以获取重商主义利益的工具。美国及其盟友已经意识到自由秩序，尤其是其核心的全球化经济，正在增强一个危险对手的力量。作为回应，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新秩序，通过将民主作为正式成员的门槛要求将中国排除在外。

新秩序的架构仍是半成品，但已具备两大关键特征：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松散型民主经济联盟正通过提供替代倡议，以及限制中国获取先进技术的方式阻止中国垄断全球经济；二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打造遏制中国的双重军事屏障。内层由毗邻东海和南海的国家组成，外层则由其他国际势力负责。这一安全合作正向着深度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以维持东亚的领土现状作为其总体目标，以“保卫”台湾作为其明确目标。

总体来看，新秩序流露出对民主秩序的积极愿景，它与中国的重商主义模式以及以新自由主义正统为核心的旧国际秩序有着根本区别。新秩序通过将民主政府以排他性网络联系在一起，试图迫使各国做出一系列价值判断，并对不自由的行为实施真正的惩罚。同历史上的秩序一样，新秩序也是一种排斥性秩序，由恐惧支撑，通过胁迫强制实施。

未来几年里，中美在贸易和技术领域的竞争仍将持续，两国的“政治战”会随之加剧，其他国家或将被迫选择立场。目前来看，虽然美国以财富和军事资产优势暂处于领先地位，但美国领导的民主秩序能否维系尚未可知。民主世界正在经历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大的信任和团结危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主义的呼声高涨，使得集体行动变得困难。对中国的恐惧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它并不足以掩盖新兴反华联盟内部的诸多裂缝。美国及其盟国都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被载入国际协定和法律的国际秩序。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及其盟友将不得不接受与中国的竞争，并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共同前进。

美国外交

中情局前官员：“转向亚洲”是美国的战略失误

美国《华尔街时报》3 月 22 日登载了中央情报局前中东项目官员鲁埃尔·格雷希特 (Reuel Genrecht) 等人的文章称，美国确实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挑战，但忽视欧洲和中东无助于美国应对这一现状，“转向亚洲”是美国的战略失误。文章摘要如下：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强国，始终把一些地区和国家置于优先地位。但是，美国对于“转向亚洲”的执念无疑已经鼓舞了其他地区的对手向美国发起挑战。正如乌克兰战争所证明的那般，美国并不能真正将自身与世界关键地区切割开。在奥巴马政府之前，没有一位总统坚持认为一个地区的紧急情况必须以忽略其他地区为代价，美国总统应该考虑的是如何与盟友一起共担风险。

拜登政府将中国威胁作为其孤立主义的掩护。对华竞争成为

了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在国内推崇费用高昂的基建法案的绝佳理由。然而，拜登却没有采取任何严肃的军事举措，也没有重新启动自由贸易联盟来制衡中国，这种言行之间的脱节十分明显。

美国在中东采取收缩行动，部分源于在该地区的战略挫败。但中东依然是关键地区，能源安全问题仍然是全球性问题，美国“页岩油革命”的爆发并没有降低波斯湾石油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在可预见的未来，远东地区仍将在美国的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

美专家：拜登对关键盟友的忽视削弱了反俄能力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3月17日登载了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彼得·罗(Peter Rough)的文章称，拜登赞扬反俄联盟的外交胜利，但实际上，他对沙特阿拉伯、波兰和土耳其这三个关键盟友的疏远削弱了西方对抗俄罗斯的能力。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自上任以来，拜登就有意回避海湾阿拉伯国家，他停止了对沙特在也门战争中的支持，撤销了也门胡塞武装的恐怖组织认定，促使胡塞武装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并且，拜登团队还认定沙特王储对记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谋杀案负责，此举疏远了其与王储的私人关系。因此，当乌克兰战争迫使拜登寻找石油替代来源时，沙特和阿联酋王储均未理会拜登的求助。而拜登政府非但没有安抚沙特王室，反而向委内瑞拉和伊朗示好。

同样的疏远也发生在美波之间。拜登团队蔑视波兰政府的民族保守主义，但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波兰不仅向基辅提供政治和人道主义支持，还成为了军事物资的中转站，是北约关键的后勤保障地区。然而，美方不久前收回了对波兰向乌克兰移交

MiG-29 战斗机的支持，这表示如果波兰单方面采取行动，将独自面对来自俄罗斯的报复。此举不仅破坏了波兰对美国和北约的信任，还可能导致未来盟国在为美国挺身而出时三思而后行。

拜登上任一年后同样降级了美土关系。拜登不仅在竞选中抨击土耳其总统是“独裁者”，还认定了土耳其对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历史。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土耳其积极支援乌克兰。但美国却悄然解除了一个受库尔德工人党控制的叙利亚地区的制裁。库尔德工人党是常年与土耳其政府交战的恐怖组织，美国的行为在严重影响土耳其国家安全的同时，也离间了其与土耳其的关系。

美学者：美国和以色列应加强技术合作应对中国

新美国安全中心 (CNAS) 智库网站近日登载保卫民主基金会 (FDD) 高级副总裁乔纳森·赞泽 (Jonathan Schanzer) 等人的文章称，为应对中国带来的多层次挑战，美国必须加强与以色列在技术层面的政策合作。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和以色列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盟友关系由来已久。双方在反恐、情报、经济和技术领域存在密切合作。然而近来，美国和以色列在对“威胁”的认知和态度上出现了分歧。美国将中国视为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以色列却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并不断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且，中国对以色列科技公司的投资基本上不受监管。为了更有效地限制中国获得新兴技术资源，美国必须加强与以色列的合作。基于此，文章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美以应建立高级别工作组，协调两国的科技政策和对华政策。组内应包含美国国务院及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代表、美以

两国私营部门、学术界、立法机构以及情报和执法机构代表等。

第二，美以应调整监管制度，确保科技产业得到保护。美以财政部官员应定期沟通，改善对中国投资审查的监管。

第三，美以应深化经济和技术合作，制衡中国。具体来看，美国应该鼓励其私营部门加大对以色列技术部门的投资，以替代中国的投资项目。并且，美以两国还应利用和增加对一些现有的美以技术合作机制的投资，包括美以研究与发展基金会（BIRD）、美以农业和研究与发展基金（BARD）等。

美国印太战略面临的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缺点在于，认为美国的政策偏好能在整个地区引起共鸣。拜登团队未来在执行和修改印太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印太区域的动态和复杂性，从现实出发，才能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和保障利益的能力。

美国《外交家》杂志网站3月22日登载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副教授泽内尔·加西亚(Zenei Garcia)的文章称，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没有考虑到该地区的动态和复杂性，难以达到设定的目标。文章摘要如下：

自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政策以来，美国日益扩大其亚太战略的地理范畴，将印度洋地区也纳入其中。然而，重新定义的效果却受到政策内在逻辑矛盾的制约，即意识在向前进，而战略假设却早已过时，并不符合印太地区的多元化和转型现实。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战略没有根据印太地区经济趋势的变化做出调整。印

度-太平洋地区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而美国却没有制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针对性的印太贸易政策，还缺席了该地区的重要自由贸易协定，这使得美国在印太的经济地位有所下降。一方面，这些自贸协定在制定标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的缺席会致其丧失决策话语权。另一方面，这在未来可能会影响美国在该地区的市场准入，最终会打击美国公司的竞争力。

第二，当前战略还需要考虑规范问题。拜登政府延续了上任政府强调的自由开放印太的规范基础。本质上，促进民主、善治、法治以及联盟体系将继续主导地区的规范议程。然而，拜登政府在遵守这些规范时，必须考虑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印太国家对这些规范的认同度。尽管许多印太国家都认同美国的规范，但一个成功的印太战略还得让那些观念不一致的国家也愿意和美国合作。如果美国的规范目标不够灵活，不足以包容区域多样性，就可能疏远潜在合作伙伴；二是印太国家对规范是否有相同解释。例如，尽管“四国集团”和东盟成员国都支持“航行自由”，但不同国家对“航行自由”有不同的解释。

第三，战略没有考虑到各国对印太地理边界的不同划定。区域空间的划分是各国制定安全伙伴优先次序和资源分配政策，以及区域机构的成员和议程的基础。在“四国集团”中，日本对印太的地理解释最广泛，其印太战略区域从东非到美国西海岸，内容包含了自由贸易协定、基础设施倡议、发展援助和安全协议。印度的战略范围最局限，地理上集中在印度洋地区和南海，内容只涉及有限的经济和安全目标，缺乏战略连贯性。这方面的分歧不利于拜登政府发现利益趋同以及存在合作可能性的领域。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缺点在于，认为美国的政策偏好能在整个地区引起共鸣。拜登团队未来在执行和修改印太战略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印太区域的动态和复杂性，从现实出发，才能提高

美国的竞争力和保障利益的能力。

CNAS: 美韩应深化技术和创新合作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网站 3 月 22 日登载了该智库印太安全项目研究员雅各布·斯托克斯（Jacob Stokes）等人的报告称，数字技术的发展已成为地缘政治的决定性因素，美韩应扩大在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合作以深化科技联盟关系。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传统安全威胁仍是核心问题。尽管美韩都认为来自朝鲜的威胁是防范的重点，但两国都在寻求扩大联盟合作以便应对更大的共同挑战。为此，美韩都意识到关键技术对于经济以及安全治理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

其次，美韩正处于技术协调初期。技术问题是目前美韩政策的核心。为了加强美韩技术合作，除了审查一般的协商框架，还需评估各部门和具体议题领域的双边互动状况。

最后，基于自由民主原则的美韩合作或能促进地区治理规范的形成。目前，美韩在基础的技术生态系统中占据领先地位，两国的合作除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之外，还能促成自由、开放、安全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基于此，文章为美韩科技合作提出三项建议：

第一，外交政策和国际组织方面：1) 高层领导人将技术领域的协商与合作作为美韩联盟的优先事项。2) 利用现有双边机制推动技术合作，探讨未来的商业竞争模式及第三方（尤其是两国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3) 美国应积极将韩国纳入涉及技术合作的新旧组织。4) 协调全球技术标准制定机构，监测技术标准发展情况，从而预测及抵制可能对两国安全和经济产生威胁的不良因素。5) 将美国“印太政策”及韩国“新

南方政策”相结合。

第二，贸易和投资方面：1) 全面落实双边投资筛查工作组。2) 探讨协调制度或扩大双边数字贸易方案。3) 确保两国半导体供应链安全。4) 加强韩国电池制造业与美国汽车公司的联系，寻求清洁能源技术上的合作。

第三，数字治理和国内政策方面：1) 根据韩国国内法律、数据保护规范以及商业敏感度调整美国关于信息技术的要求。2) 美应加强与韩国在先进电信设备领域的密切合作，确保安全网络的广泛使用。3) 美韩应加强在保护公民隐私以及打击虚假信息领域的合作，并通过数字技术加强与民主治理有关的法律法规。4) 修改签证、移民及教育政策，从而促进两国技术人员之间的互联互通。

美国政治/其他

哈佛学者：美国政府应赋予公民决策权以实现“协同治理”

美国《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网站3月17日登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研究员霍莉·鲁森·吉尔曼 (Hollie Russon Gilman) 等人的文章称，为了实现更公平和更包容的民主，必须赋予公众实质性、资源丰富和长期的决策权。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国家层面，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似乎已经破裂，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直在下降。据最新的爱德曼信任晴雨表结果显示，只有43%的美国人信任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比五年前低10个百分点，绝大多数人认为该国处于“错误的轨道”上。虽然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普遍存在，但“协同治理”或许有助于缓解这一

现状。

“协同治理”，或称“共同治理”，旨在打破民众与决策者之间的壁垒，通过转移权力建立信任，促使双方成为合作者。协同治理不可或缺的关键原则有三：

其一，协同治理要赋予人民真正的一席之地，赋予公众实际的决策权。协同治理意在建立一种公众意见能带来实际变化的机制。这意味着，掌权者必须努力建立真正的居民参与制度，而不是用“清谈会”去粉饰公众参与。

其二，协同治理不仅赋予公共决策权，而且要在资源配置上贯彻落实。真正的权力再分配通常意味着将资源重新分配给社区。参与式预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赋予公民决策权和预算权，以便能将财政资源用于公众认可的投资项目。

其三，协同治理应当促进长期愿景，建立比一次性政策胜利更持久的动力和关系。协同治理代表了一个持续的民主进程，而不是一次性倡议。协同治理应当创造积极的反馈循环，鼓励和促进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的真正尊重和对权力的共同理解。

协同治理只是扩大政府包容性的众多工具之一，其目标不仅为了提出更优质的政策，还为社区和公职人员的长期能力建设创造条件，推动合作。共治能够建立更持久、更深入的民主，并在广泛的信任中，让公众有能力和尊严在更日常的基础上参与决策过程。

《政客》：豁免学贷是拜登赢得年轻选民的关键

美国《政客》新闻网3月18日登载了该网站政治记者克里斯托弗·卡德拉戈（Christopher Cadelago）等人的文章称，拜登在学生贷款债务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可能会抑制年轻选民的中

选投票率。文章摘要如下：

为每位借款人消除至少 1 万美元的学生债务是拜登在竞选期间做出的承诺之一。但拜登团队更希望由国会牵头豁免学贷。民主党参议员曼钦 (Joe Manchin) 的反对让大多数民主党人认为不太可能在 11 月前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拜登团队可能将以第四次延长助学贷款还款冻结期的方式来缓解当前压力。但与之前的几次延期不同，此时正值选举年，缺乏关注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并且，私人贷款机构开始积极推动恢复还款程序将进一步加剧问题的复杂化。

豁免学贷倡导者认为，拜登团队的行为可能会使年轻人认为民主党不愿用手中的权力改变年轻人的财政状况。即使 5 月之前再次延长冻结期，也难以让年轻选民的投票率达到 2020 年或 2018 年的高水平。根据塔夫茨大学数据显示，2020 年大选中，18-29 岁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为 55%，高于 2016 年大选的 44%；而 2018 年中选中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为 28%，高于 2014 年的 13%。年轻选民为拜登赢得关键摇摆州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仅靠豁免学贷不太可能解决民主党在年轻群体中的投票率问题，但却是拜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可以采取的最明确，并能立即为大众所感知的措施。民主党数据公司 Target Smart 的民调数据预测，今年中期选举民主党的年轻选民投票率可能无法达到较高水平，但要保住民主党对参众两院的控制权至少要接近 2018 年的数值。学贷限制了数百万美国年轻人的未来，重视这一问题能够极大程度动员和激励参与中期选举的青年人。

民调网站 538：美国白人的受害者情结助力共和党政治

美国民调网站 538 (FiveThirtyEight) 3 月 21 日登载该站

政治记者亚历克斯·塞缪尔斯 (Alex Samuels) 等人的文章称，美国不同群体对种族歧视受害者的看法存在差异，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很多人看来，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有望治愈长期分裂美国黑人和白人的种族创伤，然而这一希望从未得到真正落实。在奥巴马初次大选前夕，有民调显示，只有约 38% 的美国白人认为奥巴马当选能帮助改善种族关系，而这一比例在黑人群体中是 60%。更重要的是，一些白人选民开始对黑人登上最高政治职位感到不满。这种不满浪潮直接推动了八年后特朗普的当选。实际上，白人受害意识早于特朗普当选之前便已诞生。从 1950 年到 2000 年代，美国白人认为整个社会对白人的偏见在增加，这种看法在 2000 年代后期尤为普遍。

拜登上台后，白人受害者意识仍在生长。有舆论研究表明，美国白人，特别是共和党人，认为白人才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而不是西班牙裔或黑人。例如，皮尤研究中心 2021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17% 的共和党人及其支持者表示，当今社会对黑人存在“很多”歧视。而当同一群体被问及是否认为白人面临“很多”歧视时，这个数字上升到 26%。

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趋势可能会持续增加。将新旧皮尤数据进行比较后发现，认为美国白人面临“很多”歧视的共和党人的比例较 2019 年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其他的民意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人对此事的看法与共和党人完全不同。“萨巴托水晶球”网站 (Sabato's Crystal Ball) 2021 年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针对白人比有色人种更有优势这一问题，38% 的特朗普选民表示一般或强烈同意，而这一比例在拜登选民中为 87%。此外，84% 的特朗普选民表示担心未来几年对白人的偏见会激增，而只有 38% 的拜登选民有同感。

如果想要解决继续困扰和分裂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共和党人，需要先摆脱受害者论述。不平等的程度能否被淡化，甚至缓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客们的叙事构建。少数族裔的受益并不意味着白人的受损。若长期强调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社会环境只会变得更糟。

皮尤：两党选民中期选举立场差异明显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月24日发表文章，披露了中期选举最新民调的相关数据，结果显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诸多问题上存在立场差异，文章摘要如下：

首先，国会控制权重要性问题。截至2022年3月13日，有63%的美国选民认为哪个政党在今年的选举中赢得国会控制权这一问题“非常重要”。针对该问题，总量虽与2018年中选年的65%基本持平，但落到党派上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歧。具体来看，约70%的共和党选民认为党派国会控制权问题十分重要，而在民主党选民中该数字为60%。

其次，影响投票的关键因素问题。从以往的中选经验来看，选民多以投票表达对现任总统的反对。此次民调结果显示，36%的选民表示其投票目的是为了反对拜登，24%的人表示投票是为了支持拜登，还有38%的人表示拜登并非影响其投票的关键因素。分党派来看，拜登因素对共和党人而言更具动员作用。共和党选民中，视投票为反对拜登的人数占71%，而民主党选民中认为拜登对其投票影响不大的人数（47%）和视投票为支持拜登的人数（46%）基本持平。

再次，投票可信度和参与度问题。大多数选民（53%）表示对中期选举的公平准确性非常或有一定信心，且民主党选民（76%）

比共和党选民（47%）更具信心。并且，约七成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公民投票权将得到充分保障，其中确信于此的共和党选民比民主党选民多出 20 个百分点。

此外，两党选民关注的议题分野明显。78%的选民将经济视为首要议题，共和党人（90%）比民主党人（68%）更重视这一问题。共和党选民聚焦移民、外交政策、暴力犯罪和政府规模议题，而民主党人更重视医保、选举政策、教育、种族、气候变化以及疫情问题。

最后，选民的选举偏好存在群体差异。从种族来看，白人选民（51%）倾向共和党，而黑人（72%）、亚裔（59%）、西班牙裔选民（50%，倾向共和党的人数仅占 28%）等少数族裔选民则倾向于民主党；从年龄来看，65 岁及以上选民更支持共和党人，30 岁以下选民则更支持民主党，且更具投票意愿；从学历来看，大学文化及以上的选民更支持民主党，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则更支持共和党。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